

出特使與它們接洽和談，對外交外面，他指出緬甸將贊同「亞細安」要求在東南亞建立和平中立區域的目標<sup>⑩</sup>，再配合他所說明的開始接受外資的政策，及先已接受了美援的十八架直昇機，並派遣情報人員赴美受訓<sup>⑪</sup>，便不難窺知緬甸的外交動向。對共產集團，將靠近中共以平衡蘇俄，對自由國家，亦將有限度接近美日與「亞細安」集團，以便開拓貿易及爭取援助與投資。不過蘇俄及其夥伴——越寮共，對它的接近中共與自由國家外策，斷不會不施予破壞，所以尼溫政權的內憂外患，勢必會與日俱增。

註⑩ 「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一、廿三、及三、二、均載于二版。  
註⑪ 同註⑩。

## 蘇聯與南亞次大陸的關係

畢英賢

俄羅斯對印度原本懷有傳統的興趣與覬覦之心，但是蘇共政權成立後，對南亞次大陸的銳意經營，却是一九五五年以後的事。二十多年來，由於印度與巴基斯坦間因克什米爾問題糾纏不清，美國對這個地區不甚關切，匪印邊界戰爭使印度需要強大靠山，於是蘇聯勢力乘機逐步進入。及至匪美「和解」開始，印蘇關係更加親近，於一九七一年簽訂了為期二十年的「蘇聯印度和平、友好與合作條約」，這是第二次大戰同盟國家拆夥後，蘇聯與非共產國家所訂的第一個正式條約。同年，在蘇聯的支持下，印度戰勝巴基斯坦並促成孟加拉的獨立；這些事實皆使蘇聯在南亞次大陸的影響力增加，匪美的影響力則相對下降<sup>⑫</sup>。

南亞次大陸的三個主要國家是：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參與南亞次大陸爭奪影響力的三個主要外來力量是蘇聯、中共及美國。蘇聯在次大陸的經營，成就雖然可觀，但是也有困難存在。今年三月印度政府改選，結果在野的反對黨聯盟獲勝。在競選期中，蘇聯對印度的政治情況估計錯誤，公開支持甘地夫人，指稱反對黨聯盟為「反動分子」和「反人民集團」<sup>⑬</sup>。因此，印度大選結果揭曉後，蘇聯當局不僅愧對印度新政府，而且對蘇印關係的維繫與發展也難免不有所擔心。四月底，蘇聯外交部長「應邀」訪問

註① 格里夫斯（W. Griffith），北平、莫斯科及其他（華盛頓市·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一九七三），第三十六頁。

註② 例如，特里契揚可夫（V. Tretiyankov），「印度大選初期」，新時代（Novoe Vremya），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第七期，第二十一頁。

印度，簽結三項協議。目前，蘇聯與印度新政府的關係似乎已趨穩定。但是，未來的發展究竟如何？尚是一個需要從多方面探測與分析以求解答的疑問。本文將以蘇印關係之發展為軸線，試行探討蘇聯對南亞次大陸的政策及其追求政策目標的手段與活動；然後，再研析蘇印關係發展的趨向。

## 舊夢想與新目標

沙皇俄國以及一九一七年以後的俄國共黨政權，皆視印度為其向外擴張的重要對象。南亞次大陸除有廣大的面積、衆多的人口、豐富的資源外，其戰略地位也一向是俄人追逐的目標。俄國彼得大帝曾為印度——「亞洲的寶石」——着迷，他說過：「誰統治那裏，他就是世界的真正統治者……印度是世界的倉庫<sup>③</sup>。」事實上，幾個世紀以來，沙俄一直企圖藉軍事征服，佔領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奪取伊朗和阿富汗，進而南下進窺印度，打通一條從陸上伸向印度洋的通路，把勢力範圍擴展到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克里米亞戰後，俄國積極向南進取。一八五八年時，恩格斯曾說：「自從俄軍這樣深入中亞細亞以後，從北方進攻印度的計劃，已經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圖，而是具有相當明確的輪廓了<sup>④</sup>。」沙皇俄國雖然對印度野心勃勃，但是力不從心。英國已捷足先登佔據印度，沙皇俄國的力量很難與之抗衡。但是，俄國進犯伊朗、佔領中亞、滲入阿富汗，都是為了進攻印度開闢通路，給印度造成嚴重威脅。此外，恩格斯在「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一文中，也揭露了俄國的企圖<sup>⑤</sup>。但是，蘇共政權並不承認這個史實，並為沙俄辯護說：「俄羅斯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在那段時期內（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沒有執行侵略其南方鄰國的政治與經濟動機」，祇希求與印度建立互惠的經濟關係<sup>⑥</sup>。這一類言論不僅是為沙皇俄國清洗污點，也是想藉此為現今蘇共對印度的政策辯解。俄國共黨獲得政權後，把沙皇俄國向印度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目標轉變為其與西方國家進行「反帝鬥爭」中的一個殖民地革命目標。「到巴黎之路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達」，這句話道破了亞洲殖民地在蘇共所領導的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性。在蘇聯的對外政策

註③ 沙艾克斯（P. M. Sykes），波斯史，第二卷（London: Macmillan & Co., 1930），第一四四頁，引自庫卡裡（Maya Kulkarni），印蘇政治關係史（Bombay: Vora & Co., 1968），第二十五頁。

註④ 弗·恩格斯，「俄國在中亞細亞的進展」（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十一卷，第六四一頁。

註⑤ 同前，第二十二卷，第五十頁。

註⑥ 梭羅維耶夫（O. F. Sologubov），「論沙皇俄國在十九世紀及廿世紀初對印度的關係」，歷史問題（Voprosy Istorii），一九五八年第六期，第一〇九頁。

中，隱藏着舊俄的「擴張主義傾向」<sup>⑦</sup>、俄式的「救世主義」<sup>⑧</sup>、及「泛斯拉夫主義」<sup>⑨</sup>。列寧會把印度描寫為「東方革命的城堡」並且露骨地說「印度是我們的目標<sup>⑩</sup>」。一九四〇年，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對德國外交部長瑞邊托勞普（Von Ribbentrop）說：「蘇聯領土願望的焦點大抵集中在導向印度洋的蘇聯南方的領土<sup>⑪</sup>」。

非常清楚，俄國的統治者始終視印度為其向東方及東南亞甚至歐洲擴張的據點；由此可見印度在蘇聯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目前，蘇聯對印度的經濟與技術援助業已增加，使它在南亞次大陸佔據極為有利的地位；雖然由於國際形勢的限制，蘇聯尚不能實現俄羅斯傳統的夢想，但在檢討蘇聯對南亞次大陸的政策時，不應忽視這一常數。

就當前的整個國際形勢論，美國的政策目標是維持現狀；蘇聯乃是推行一種「前進戰略」（Forward Strategy），尤以對第三世界為然<sup>⑫</sup>。蘇聯執行「前進戰略」，一方面是由於美國的退却，另一方面，是要實現傳統的俄羅斯霸權主義欲望，同時也是為了對付中共的挑戰。蘇聯海軍力量在印度洋的出現和增長，固可解釋為，協助印度抵制中共、或限制中共在亞非勢力成長的措施<sup>⑬</sup>；但是，這種力量可以輕易掉轉箭頭對付西方。簡言之，俄羅斯的舊夢想與蘇共的新目標在本質上並無多大差異。

## 從敵視到友好的印蘇關係

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時，莫斯科正忙着整頓東歐，未能立即利用印度境內的嚴重問題進行革命顛覆。在史達林的統治期間，蘇聯對印度政府始終不甚友善。他堅決相信，印度政府是英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一九四七與四八年間，印度共產黨遵從莫斯科的指示採取強硬路線，遂使該黨在印度人民中陷入孤立，在印度內政問題上無直接發言權。一九四八年印共在鐵倫格納（Telengana）企

註⑦ 赫斯查（G. Huszar）編，蘇維埃力量及政策（紐約，一九五五），第三七三頁。

註⑧ 湯普金斯（D. Tompkins），從彼得大帝經過啓蒙運動的俄人願望（*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hrough the Enlightenment*）（Norwan, 1953），前頁第十頁。

註⑨ 康（H. Kohn），泛斯拉夫主義（Notre Dame, 1953），第1110頁。

註⑩ 此句出現在在托勞揚勞夫斯基（K. Troyanowski）所寫之「東方與革命」（*Vosto i Revolutsia*）一文中，按托氏係奉列寧之命撰寫該文。引自倫左夫基斯（G. Lenczowski），俄國與西方在伊甸（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9），第十頁。

註⑪ 斯勞托克及拜得耳（R. J. Sloutag and J. S. Beddoe）編，納粹蘇聯關係（*Nazi-Soviet Relations*）德國外交部文件（華盛頓，國務院，一九四九），第1111頁；引自庫卡涅，第二十六頁。

註⑫ 魯賓斯坦（Alvin Z. Rubinstein），「七十年代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Orbis*」，第十五卷第一期（一九七三），第一〇七頁。

註⑬ 同前，第一一〇頁。

圖擄起暴動未果，而印共的不妥協立場使印政府對蘇聯的居心，更加疑懼。因此，莫斯科的領袖們開始理解到，欲透過印度共黨以增加其在南亞次大陸的影響力是行不通的。必須另籌良策。

一九四九年，中共偽政權出現，印度必須與其建立友好關係，因為一九四八年的克什米爾之戰已使印度與巴基斯坦相互仇視，印度必須避免再與中共發生邊界衝突，以免兩面受敵。當時中共對於印度也反應良好。在中共眼中，匪印保持良好關係，可以提高中共在亞非地區的聲望。一九五四年，美國與巴基斯坦簽訂軍事條約，在南亞獲得軍事基地，匪印友好關係隨之增長；此時，印度對蘇聯依然不甚信任。

史達林死後，蘇聯新領袖，尤其是赫魯雪夫認為埃及與印度並非「帝國主義的走狗」。中立主義或不結盟政策可以利用；蘇聯應維持中立主義的存在以增加西方的困擾，進而在這些地區建立蘇聯自己的勢力。五十年代中期，蘇聯的經濟已能向亞洲國家提供武器與工業設備。同時蘇聯領導相信，民族主義浪潮有其「革命」的潛力，如果滲以蘇聯的影響力，更可使民族主義領袖趨向極端，進而採取「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尼赫魯相信，史達林死後，蘇聯的政策危險性已降低；他希望，增加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和蘇聯的接觸，可間接導致蘇聯共產集團內部的自由化，也可使印度共產黨蛻變成一個正常的政黨<sup>14</sup>。

一九五五年，印蘇兩國最高領導人相互訪問，蘇聯向印度提供貸款。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六二年中（共）印邊界之爭，使蘇聯在南亞次大陸的處境極為尷尬；據說，中共掀起這個問題旨在向蘇聯的「和平共存」理論及支持不結盟立場挑戰。蘇聯迫不得已，在中（共）印爭執中採取中立立場。這一兩邊不討好的立場，雖為印度所諒解；但中共與蘇俄的關係，却因此而惡化。一九六一年在果阿問題中，蘇聯大力支持印度對抗西方。一九六二年，中共廣交印度周圍諸國，且特別重視巴基斯坦，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無條件給予大力支持，與蘇聯針鋒相對。此時，美國與巴基斯坦關係也開始走向下坡。

另一方面，蘇聯開始強調印巴之間的和平，以防止美國和中共的進一步介入；中（共）印之爭後，美國也不得不支持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一九六五年，巴基斯坦聯毛制印的做法，終於使南亞次大陸的形勢再度緊張，印巴之間發生了另一次衝突。蘇聯一改在印巴問題上偏袒印度的立場，而採取中立。蘇共真理報說，加強蘇聯與巴基斯坦的關係是蘇聯維護亞洲及全世界和平的一部分；蘇聯希望蘇巴關係成為亞洲安定因素之一，並且藉此使印巴關係正常化<sup>15</sup>。蘇聯如此做法，最主要原因是怕中共在巴基斯坦的影響力擴張。在這次印巴衝突中，中共全力支持巴基斯坦，譴責印度；同時在中印邊境上製造緊張。

九月七日，蘇共發表聲明<sup>16</sup>，呼籲印巴雙方撤兵，並願從中斡旋終止紛爭。九月底雙方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同意停火。蘇聯並

註<sup>14</sup> 巴恩茲（W. J. Barnds），「莫斯科與南亞」，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月，第十五頁。

註<sup>15</sup> 觀察員，「迫切的需要」（*Nastoyatelnaya Neobkhodimost'*），真理報，一九六五年八月廿四日，第二頁。

註<sup>16</sup> 「塔斯社聲明」，真理報，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邀請巴總統阿育布（Ayub）及印總理夏斯屈（Shastri•尼赫魯的繼承者）至蘇聯境內的塔什干（Tashkent）談判，以覓求和平解決爭執之道。一九六六年初，雙方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的積極斡旋下達成協議，雖然未能消除基本歧見，但已使雙方恢復正常關係。這是蘇聯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勝利。中共雖然攻擊塔什干會議是美蘇企圖助印反巴的陰謀，但是未曾攻擊巴基斯坦政府的參加，同時也未曾終止對巴基斯坦的援助。

蘇聯在塔什干的外交成就，以及美國對印巴的更加疏遠和忙於越戰，使蘇聯在南亞次大陸的聲勢與影響力更加壯大。蘇聯一方面對印度繼續給予軍經援助；另一方面，也更加迎合巴基斯坦的需要，以防止它脫離美國陣營後投入中共懷抱。巴基斯坦投靠蘇聯的目的有三：（一）使蘇聯在印巴爭執中維持中立，（二）獲得蘇聯裝備，使巴基斯坦不致單獨依賴美國或中共，（三）減少蘇聯對印度的軍備供應<sup>⑯</sup>。一九六八年，巴基斯坦宣佈終止讓美國在巴基斯坦設置電子情報設施；同時，與蘇聯成立軍火協議。對於後者，印度雖然氣憤，但無可奈何。

蘇聯在南亞次大陸所玩弄的制衡政策產生了有利的效果。當蘇聯海軍進入印度洋時，印度與巴基斯坦皆視若無睹，傳聞莫斯科曾要求印度與巴基斯坦准其在印度洋設立海軍設施，但兩國政府皆否認該傳聞的真實性。

一九六九年印度執政的國大黨分裂，蘇聯支持甘地夫人反對較保守的國大黨領袖；蘇聯如此做的動機是，唯恐右派得勢後傾向西方。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大勝，蘇聯與印度的關係更加緊密。

## 印蘇友好條約和孟加拉事件

一九七一年三月東巴基斯坦發生內戰，大量難民湧向印度。新德里方面深恐因此引起印度內部的動亂，威脅其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的前景，所以一方面迫使巴基斯坦新總統雅赫雅·汗（Yahya Khan）與孟加拉領袖談判，另一方面悄悄地援助在東巴組成的游擊隊；同時說服外國政府對雅赫雅·汗施加壓力，使其終止鎮壓進行談判。

此時，蘇聯統治者立刻理會到，與印巴同時維持友好關係已不可能。四月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包戈尼向巴基斯坦總統發出呼籲書，勸其停止「流血鎮壓」<sup>⑰</sup>。這使巴基斯坦大吃一驚，但是巴政府並未回擊，因為恐怕這種反擊可能促使蘇印聯合反巴。所以，蘇聯輿論也在好幾個月內停止對巴批評。蘇聯表現得謹慎小心的理由之一是，恐怕一旦印巴戰起，中共將會介入。當時，中共一反其民族解放政策原則，不支持孟加拉人民的種族鬥爭，而支持西巴保守政權；主要原因是西巴政府一向敵視印度。中

註<sup>⑯</sup> 巴恩茲，第十九頁。

註<sup>⑰</sup> 「包戈尼致巴基斯坦總統呼籲書」，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第一頁。

共一方面譴責印度的擴張主義行爲、批評蘇聯居心叵測的偏袒行爲，另一方面聲明「一如既往，堅決支持巴基斯坦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的正義鬥爭」<sup>⑯</sup>。周恩來並向巴總統表示，支持其國土之完整。美國政府沒有對巴政府施加壓力，並且認為，公開譴責與終止武器出售並不能影響巴政府。這一態度的真正原因於七月間終於大白於天下，原來巴基斯坦為匪美談判打開了通道，並為季辛吉安排訪問北平。即使沒有印巴衝突，匪美任何程度的接近，也都使印度當局擔心。在匪美接近的過程中，一旦中共對印度挑釁，印度再也不能依賴美國的援助。印度軍事力量在六十年代中雖然有了改善，但是一九六二年匪印邊戰中的慘敗記憶猶新。在此情況下，印度對蘇聯的武器供應與合作更加迫切需要。

此時，華盛頓宣佈尼克森將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也使莫斯科的領袖吃驚，他們一向擔心的「匪美勾結」，似乎即將成為事實。蘇聯高層領導，於是展開廣泛的外交活動，以表示蘇聯對外政策廣受歡迎；它在南亞次大陸把握良機，同印度簽訂了一項為期二十年的「印度蘇聯和平、友好與合作條約」<sup>⑰</sup>。這個條約鞏固了印蘇關係，蘇聯也可通過這個條約對印度施以某種程度的約束；同時，這也可視為蘇聯所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初步成就。

簽約後，蘇聯的軍火源源運至印度；但是雙方在孟加拉問題上仍存在着歧見，蘇聯為討好大部分亞非國家，設法不使巴基斯坦分裂。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歧見絲毫未損及雙方的友好關係。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印度在東巴邊境增強軍事壓力，迫使巴基斯坦對西印度發動陸空攻擊。根新訂之條約，蘇印雙方應「採取適當而有效之措施，以確保雙方國家之和平與安全」<sup>⑱</sup>。於是，蘇聯堅決支持印度。另一方面，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利用否決權，使安理會無法通過譴責印度之決議案；因此，印度迅速擊敗了巴基斯坦的軍隊。北平面犀利地攻擊印度為擴張主義者，企圖分裂巴基斯坦，想在東巴成立傀儡政權；並且說：「所謂孟加拉國不過是昔日所謂滿洲國的再版而已」，而「印度所以這樣猖狂，是因為得到社會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持」；並指印蘇條約「實質上是軍事同盟條約」<sup>⑲</sup>。中共根據這一事件下斷語說：「蘇修加緊推行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政策以圖達到……控制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同美帝爭霸的目的」<sup>⑳</sup>。也許由於蘇聯在中蘇邊境駐有大軍，中共未曾採取任何有威脅性的軍事行動，因此印蘇把中共的口頭攻擊未放在眼裏。

美國譴責印度應負戰爭爆發的主要責任，同時派遣一海軍特遣隊進入孟加拉灣；兩者皆未能遏阻甘地夫人既定的行動方針。結果

註⑯ 評論員，「印度擴張者意欲何為？」，人民日報（匪），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第一頁。

註⑰ 同前，第九條。

註⑱ 「印蘇和平、友好與合作條約」原文載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

註⑲ 新華社電稿，人民日報（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五頁。

果，孟加拉成為獨立國家，西巴基斯坦慘敗，印度稱霸南亞次大陸。中共與美國在這個事件中無能為力，使蘇聯在南亞次大陸獲得一次極大的勝利。以較大的歷史層面看，印度的勝利是回教在南亞次大陸的失敗，同時也標誌着西方勢力在印度的結束，在短時間難以恢復；印度的勝利又意味着布列茲涅夫在南亞次大陸政策的成功。

## 新情勢下的印蘇關係

自從印蘇訂約、印巴戰爭、和孟加拉獨立後，印蘇關係表現得非常密切，兩國官員頻頻互訪，相互貿易屢增。然而，雙方間所存在的基本歧見並未消除。例如，印度政府一直未正式支持布列茲涅夫一九六九年所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蘇聯海軍在印度洋與美國艦隊爭相出現，使早年尼赫魯所提出的和印度一貫追求的「和平區域」構想之實現，更加渺茫。

蘇聯得以插手南亞次大陸，乃是由於印巴不和與毛印之爭。印度深切了解蘇聯南進另有企圖，因此始終力圖與中共和巴基斯坦修好以抵銷蘇聯勢力。一九七二年七月，印巴間成立錫姆拉協議（Simla Agreement），布托總理（Bhutto）與甘地夫人同意採取一系列步驟，以不斷地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但是，因為印巴間基本爭執（克什米爾問題）未獲解決，雙方關係雖獲改善，但是很難達到親善友好的程度<sup>22</sup>。巴基斯坦方面亦不願接受印度所提出的「雙邊主義」。所謂「雙邊主義」就是兩國在解決爭執時祇需相互協商，不讓任何第三者參加<sup>23</sup>。

一九七六年中，毛印關係也有了轉機，雙方經過談判後恢復了大使級使節，這是一九六二年毛印戰爭後的創舉。最近，雙方已同意舉行談判，討論中斷了十五年的毛印貿易問題。

孟加拉同印度的關係發生了問題。一九七一年孟加拉獨立後，印度以屬國待之。一九七五年八月孟加拉政局發生了變化，新領導儘力爭取獨立主權，印度政府則相應施加壓力使其馴服；最露骨的事例是，印度違背一九七四年的雙方協議，突然轉導恆河水流向，使孟加拉無水灌溉，今春恆河談判失敗，致使這一問題仍舊懸而未決。另一事例是，印度政府收容孟加拉反政府分子。很自然，孟加拉所執行的內外政策帶有濃厚的反印度霸權主義色彩<sup>24</sup>。相反的，孟加拉與巴基斯坦關係已獲改善。一九七六年五月曾簽訂三年貿易協定，並相互在對方城市開設銀行。

今年三月，巴基斯坦選舉，人民黨獲勝，布托總理連任。反對黨（巴基斯坦全國聯盟）認為選舉有欺詐之嫌，要求布托辭職，

註<sup>22</sup> 帕米爾（N. P. Palmer），「一九七六年的印度：降低政治性的政策」（India in 1976;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亞洲觀察*（Asian Survey），第十七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二月），第一七六頁。

註<sup>23</sup> 賽德（Anwar H. Syed），「一九七六年的巴基斯坦：事務如常」，*亞洲觀察*，第十七卷第三期，第一八八頁。

註<sup>24</sup> 曼尼羅查曼（T. Maniruzzaman），「一九七六年的孟加拉國：為獨立國家之生存而鬥爭」，*亞洲觀察*，第十七卷第三期，第一九二、一九三頁。

重新舉行選舉。至今騷動未已。蘇聯支持布托，贊揚人民黨的成就，指責反對黨鬧事<sup>㉑</sup>。四月二十八日，布托指控美國是巴國動亂的幕後支持者。五月初，美國國務卿范錫致函布托否認其事，並警告布托勿公開攻擊美國以免損及兩國關係<sup>㉒</sup>。布托演講前數週，美國停止輸送鎮暴催淚彈至巴；演講後數天，美國將兩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驅逐艦交巴<sup>㉓</sup>。這一事實說明，美國欲保持目前的美巴關係，但避免介入巴國內部政治鬥爭。由於反對黨係右派保守黨，美國自然願意它能掌握政權，以便增強其在南亞次大陸的地位，惟不願作露骨表現。

今年三月中旬，印度舉行了大選。從印度獨立以來連續執政三十年的國大黨慘敗，印蘇關係面臨新的轉捩點。競選期間，蘇聯輿論偏袒甘地夫人，指責反對黨。因此，當反對黨聯盟獲勝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後，蘇共領導對印蘇關係的前途不得不心生狐疑。在新的形勢下，印蘇關係是否會有轉變？

按照一般看法，甘地夫人下台將影響東西權力的平衡和印度對其他國家的關係。舊印度政府，在理論上，執行不結盟政策；但是，實際上却傾向蘇聯，致使蘇聯在南亞次大陸勢力獨熾。新總理德賽（Morarji Desai），雖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堅決反共，誓言執行絕對的「不結盟政策」，並有傾向西方的可能<sup>㉔</sup>。新政府認為，同蘇聯保持良好關係並不排斥新德里同北平和華盛頓改善關係的可能。卡特政府已公開表示，同情印度；他於五月初致函德賽，希望改善一九七一年以來的始終不甚融洽的美印關係。

印度外交部長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eyi）於三月底宣稱，印度的對外政策不會立即改變或有任何重大改變，在大多數情況下，印度政府將執行前任政府所採取的同一政策<sup>㉕</sup>。在蘇聯方面，自從甘地夫人失敗後，其新聞喉舌對印度選舉的結果避不作任何評論，却強調印蘇兩國繼續其政治與經濟合作的好處。當印度邀請蘇外長訪印時，蘇聯立卽表示同意。蘇聯似乎認為，印度議會政治的特性以及國內外形勢，都不容許印度的對外政策作急劇的轉變；而與印度新政府就很多問題，包括雙邊合作，進行廣泛的交談是絕對有利的。事後，蘇共機關報說，印度這項邀請是「新政府的一項具體步驟」，以維護印度在對蘇關係上不變的友誼方針<sup>㉖</sup>。要言之，蘇外長葛羅米柯訪印之目的是：親身評估一下印蘇關係中的危機程度并相機「加強友好關係」。

四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葛羅米柯在印度進行了「友好訪問」；與印度總統、總理及外交部長舉行了會談，簽訂三個協議並發表聯合公報。

註㉑ 浩赫羅夫（N. Khokhlov），「選舉後的巴基斯坦」，消息報（*Izvestiya*），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第三頁。

註㉒ 美聯社電，中國新聞報（英文），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第二頁。

註㉓ 同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第二頁。

註㉔ 時代週刊（*Time*），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第五頁。

註㉕ 路透社電，「印新外長談政策」，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頁。

註㉖ 格奧吉耶夫（N. Georgiev）：「蘇聯與印度：經過考驗的道路」，真理報，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第三頁。

根據聯合公報，雙方對過去兩國關係之發展，表示滿意，決心遵行一九七一年印蘇條約；同時雙方在公報中特別提出：(一)不盟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二)南亞次大陸各國家間之相互關係有正常化之必要；雙方主張以和平談判解決紛爭，該地區以外的第三者不得參與；(三)準備促進印度洋為「和平區」<sup>33</sup>。顯然，這三點皆是印度一貫追求的目標；蘇聯在公報中予以確認，頗有安撫之意。其次，蘇聯對不結盟國家早已加以運用，故對於上述第一點，自亦樂予同意。但是，第二點與第三點，則不是蘇聯政府願意輕易說出的。原因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戰爭中，蘇聯的間接參與不僅使印度獲勝，而且使蘇聯在南亞次大陸的影響力陡增，故第二點所言，與此相較，顯示出蘇聯立場之前後矛盾；至於印度洋，蘇聯海軍勢力正在增長中，如果劃定其為和平區，則蘇聯海軍勢力必須從印度洋上撤走；這與俄國南下印度洋的傳統目標，亦相違背。

三個經濟協議分別是經濟技術合作協議，設立對流層通信協議及貿易協議，也可視為蘇聯對印度新政府施惠的手段。

由於蘇聯作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讓步與經濟上的示惠；蘇聯政府終於達到其最低限度目標——維持印蘇友好條約和友好關係。這使「帝國主義集團」所懷有的「印蘇關係冷卻的希望」落空，蘇共遂心滿意足地說：「這個訪問獲得了重要的政治成果<sup>34</sup>。」

蘇外長訪印及其結果表明印蘇關係不會「立即」發生「重大」改變。因為，無論印度新政府喜歡或不喜歡蘇聯，它仍然是印度軍事裝備的主要供應者，是印度核子計劃稀有原料（例如重水）的唯一供應者，是主要貿易對手之一。而且同蘇聯保持良好關係還可以制衡美國與中共。

## 結論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印度與蘇聯的關係逐漸改善，其基礎是：(一)印度的不結盟政策與蘇聯所倡導的「和平共存」原則相呼應；(二)印度的反殖民主義與蘇共的世界「反帝鬥爭」起共鳴；(三)稍後，圍堵中共勢力進入南亞次大陸與迫使美國影響力撤退，成為印兩國的共同目標。結果，蘇聯勢力不僅插足南亞次大陸，而且正在進入印度洋。

印度新政府執行多面平衡外交，故印蘇關係未發生劇變。但是，由於印美關係有好轉可能，毛印關係亦已開始改善，而甘地夫人的下台更可能會加速這個過程，因此蘇聯在南亞次大陸的優勢將相對降低。巴基斯坦的政局雖然不穩，然而即使反對黨獲得政權，其對外政策在整個次大陸形勢的局限下，也不會立即發生劇變。

蘇聯盡一切可能維持同印度的友好關係，其近程目標為：(一)使印度在世界性的對峙中成為一個緩衝地帶，甚至成為蘇聯的盟友；(二)在中共與蘇俄衝突中發生制衡作用；(三)使印度成為蘇聯塑造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導分子。就蘇聯的遠程目標看，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遲早將成為東西力量的爭奪場。

註<sup>33</sup> 「蘇印聯合公報」，消息報，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三頁。  
註<sup>34</sup> 格奧吉耶夫，第三頁。